

[文章编号] 1002-5685(2006)09-0075-04

关于《汇报》的考证

孟 鹏

(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北京,100872)

[摘要] 本文通过详细考证已有材料,试图以解释研究的角度解析《汇报》创办的由来,及清洋行买办唐廷枢和改良政治家郑观应之于《汇报》的关键作用。

[关键词] 《汇报》、唐廷枢、郑观应

[中图分类号] G206.2

[文献标识码] A

1874年创刊于上海的《汇报》,史书多记载其创办人为我国近代留学第一人——容闳。戈公振在《中国报学史》一书中称:“《汇报》于同治十三年五月初三日创刊于上海,为容闳所发起,集股万两,投资者多为粤人,招商局总办唐景星实助成之。”^[1]方汉奇在《中国新闻事业通史》中记载:“《汇报》创刊于1874年6月16日,发起人为容闳。1872年,容闳以留美学生副监督的身份赴美,次年短期返国时筹办了这份报纸。旋又去美,未参与报务。入股的大多为容闳的同乡广东人,招商局总办唐景星给予该报积极支持。”^[2]

而容闳在其回忆录《我在中国和美国的生活》(My Life in China and America)^[3]中却未提及创办《汇报》一事,究竟出于何种原因,无法悬测。根据容闳年谱推断,容闳当时身为中国第一批赴美留学幼童的副监督,正持节海外,责有所专,是不可能事必躬亲,处理报馆事务的。^[4]据《唐廷枢研究》^[5]作者称:“十九世纪八十年代以后,随着唐廷枢的经济活动逐渐由流通领域的商业转向生产领域的工矿企业,在他参加资本主义企业活动之前,他已经对一家有发

展资本主倾向的报纸即《汇报》,给予经济上的支援。”^[6]

唐廷枢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个著名的洋行买办,曾为侵华史最久的英国洋行——怡和洋行(Jardine Matheson and Co.)服务长达十年,他对19世纪中国买办阶级的产生,洋行的早期活动,买办资本的积累以及后来民族资本的形成,都有深刻的影响。通过对唐廷枢在《汇报》创办前后活动的研究,称唐廷枢是《汇报》的真正发起人,应该是更为贴切和准确的说法。至于报纸的具体规划,则是由郑观应来完成的。

唐廷枢与《汇报》

唐廷枢(1832-1892),字景星,亦作镜心,广东香山县人。香山临近澳门、香港,中国近代早期的买办,很多从这里产生。和唐廷枢同乡并且先后不久担任洋行买办的徐润和郑观应,就是其中的代表。

唐廷枢少年时期在香港的一家教会学堂——被他称为执行“彻底的英华教育”^[7]的母校——马礼逊教科学校(The Morrison Educa-

[收稿日期] 2006-05-12

[作者简介] 孟鹏,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研究生。

tional Society School)——接受了六年(1842-1848)的西式教育,这所推行殖民主义教育的学校可称得上是中国早期洋行买办的养成所。唐廷枢从这里学得一口好英语,他后来还写过一本名为《英语集全》的书^[8],书中第六卷为“买办问答”。

1861年唐通过他的同乡——怡和洋行买办林钦的介绍,代理该行长江一带生意。两年以后,唐廷枢正式接替林钦,开始了他长达十年的买办生涯。^[9]

唐廷枢在旅沪粤商中,不但有经济实力,也有政治地位,堪称当时旅沪粤人的领袖。1872年,唐廷枢等人在署理上海知县叶顾之的支持下,在二摆渡地方买地,成立广肇公所。

徐润在《记倡议成立广肇公所缘起》中说,“先时余与叶顾之,潘爵臣两观察合买二摆渡地方吴宅一所,计地基十亩,价银三万一千两。未几,诸同乡创议公所,时叶顾之观察权知上海县事,同与是议。先四叔荣村公,唐景星诸公创捐集款,设席于余之宝源祥号,是晚诸同乡颇赞成叶公建议,将余三人合置吴宅产业照原价让出作公益之用,三人各捐银千两,首为之倡。此后凡广肇两府之事,俱归公所经理,联乡里而御外侮,公益诚非浅焉。”^[10]上海三个对外贸易关系密切的同业公所——丝业、茶业两公所和经营鸦片的洋药局,在1868年以前,都已先后建立。唐廷枢和他的同行徐润等人则都是这三个机构的董事,是把持这些机构的核心人物。

1873年中,唐廷枢脱离怡和洋行,参加当时以李鸿章为后台的轮船招商局的改组工作,“招商局总管委员今改派唐君廷枢号景星者,择于六月初一日接事,据闻随代资本开南浔轮船入局营运,而唐君久历怡和洋行,船务亦深熟悉,自后招商局必多获利也。”^[11]在其一生的活动中,这是一个重要的转折。它标志着原来作为外国洋行得力工具的买办,这时又成为洋务派官僚的有力助手了。

而为怡和洋行服务长达十年的唐廷枢的离开,对怡和来说则是一个重大的打击。唐廷

枢脱离怡和去当招商局的总办,尽管招商局并不是纯粹的商办企业,谈不上是真正的民族资本,但是,他到那里去,却是运用他在东方一家第一流的外国公司任职时“获得的丰富而广阔的经验”去损伤这些外国公司”。

如前所述,1873年1月14日招商局创办这个重要举措,不可避免要与洋商争利,挽回利权。洋商也明白地做出反应,用跌价竞争等办法,妄图挤垮招商局。^[12]对于洋商的行径,招商局当然也要采取措施应对。而唐廷枢在掌握这个重要企业之后,也希望有一个报纸表达自己的思想、主张,以扩大自己和企业的影响。^[13]此即为《汇报》之发轫。

郑观应与《汇报》

报纸的具体规划,则是由郑观应完成的。郑观应当时是招商局的股东,还担任太古轮船公司的总理。《汇报》创办,郑氏参与策划并撰写了《创办上海汇报章程并序》,记述该报旨趣与具体办法。

郑氏在序言中指出:“盖闻西洋向有新报馆之设,原以励风俗、宣教化,俾善者劝而恶者惩,兼之采朝野之新闻,穷格致之物理,下及舟楫留行,市厘货价,烂然备列,流遍寰区,扩充见闻,增长绅智,自非妄谈国政、空论是非者比,有益于民生国计、世道人心,岂浅鲜哉!”
“若夫遐迩名流、才智之士,苟有鸿词伟论,发人深警,自当亟为登录,庶知我中国人才有高出寻常万万者。窃私上海为华洋辐辏之区,事蹟人稠,足资观感。拟欲仿照泰西新报,兼译洋文,传述中外风土人情,格致功用,既可维持风教,又堪裨益民生。夙志未果,心殊惜之。兹集同人,共襄美举。纠集千股,汇成万金。兴创大局,必期先定格式,俾各循矩蹈规,以垂久远。”
由上引文字可知《汇报》章程的拟订者已洞悉报纸的一般社会功能与效应,它尤重视开启民智、净化风俗的责任与作用。当时清政府尚未颁布报律,为防止官方不必要的干预,发刊之初先立规矩以自律,是十分必要的。^[14]

至于详细办法,郑氏拟订章程十三条。其中第一条规定:“本局设上海,名曰汇报局,公举董事数名协同商办。一切局务议交邝君容阶一人总理,以专责成;其余局内司事人等,必须认真选充,查明来历,出具保结,方可任用。务以各尽各责,不得人浮于事,设有差池,惟原保事问”。第二条规定:“本局汇合资本一万两为率,分作一千股;每股先付规银十两,每两每年一分官利,闰月不计”。三、四、五、六各条,规定银钱存息、经费开支、总理权责及局员制度。第七条写明:“本局专以翻刻中外新闻,逐日传报,以期改良社会之习惯,周悉外人之风尚,考较商业之良窳,增进国民之智慧,尤要协力同心,公正办理,以图生意畅旺”。八、九、十、十一、十二各条,分别言明每年盈余、账目制度、股票收存与出让、股份更换等规定。关于股票出让,规定“一经售定,即行到局注部转换股票,但不准让与洋人”。第十三条是:“反有到局请刻新闻,其词句间或讥人私恶,或败人名节,是非混淆,种种恶习,概勿承刻,免生事端。如事实关要,必期刊刻传播,使大众咸知者,务须先觅殷实保人,兼任出具保结,然后方准刊入日报,以昭慎重”。^[15]章程规定,该报纯为中国人的报纸,主权在我,其余可做权宜处理。

《汇报》的持论倾向

《汇报》的持论与当时在上海影响最大的报《申报》(当时为洋人林乐知主持)不同。所以《中西闻见录》在介绍上海报纸时便说:“兹闻有广东富居上海者,以从前《申报》持论有不允当处,恐将来有偏袒不公,遂另设一局。”^[16]

在《汇报》发刊之前,《申报》已经有所考虑,因此对《汇报》的评论颇有嘲意。1874年3月12日载文说:“现闻粤人拟在上海另开新闻馆一所,首先提倡者,上海令叶邑侯也;提议开馆者,唐君景星诸人也;倡立馆规者,容君纯甫也;主笔诸君,皆延请粤中名宿也。馆则设立于招商局侧,并闻另延西人代为出名。”又说:“但赫赫县尹,堂堂粤绅,办此小事,尚不敢出头,

反请西人露面,未免心欲大而胆欲小矣。初议各人股份,捐凑办理,后又议用广所公项,凑补不足”。该评论还说:“夫在今日,叶君则上海邑侯,唐君则招商局总办,其余亦皆有财有势。开设之后,即有得罪他人之处,谁敢于官长为难?但谚有云:‘花无百日红’;倘叶君一旦升迁去任,另易他省之人,无事则已,不幸有事,吾亦将为主笔之人危矣。”^[17]

如果仅从香山人固结同乡的观念出发,或者专为与《申报》作对,来理解唐廷枢、容闳等人创办《汇报》,这种说法显然是有失确切的。《汇报》持论”与《申报》有别,即是反映了中国商人的诉求。“夫西商之入我中华,不过载货而来,初不为买货而返计也。后因华人无载货往彼国者,因之以货来者,遂易货去耳。今火船往来中国者正多,获利亦巨,各国皆有轮船公司,在华人亦应会和公司,专造轮船运货出进,自取其力,无庸附搭他国也。”^[18]这个论点反映了唐廷枢当时的要求,即号召发展民族运输业,抵拒权利外溢。这种立场,在一篇答辩文章中也得到反映:“本局为中华日报,自宜求有益于华之事而言之,故于有裨中国者,无不直陈,而不必为西人讳也。”^[19]

19世纪中叶,正是英国在世界各地推行殖民主义之际,鸦片战争使中国丧权辱国沦为殖民地半殖民地。而《申报》早期的报道和评论中涉及英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在中国的土地上推行殖民主义政策这个要害问题上,有惟英国殖民者的利益是从的表现,比如:“英国昔年属国繁多,为天下向来所未见。乃英国人近年多以为虑,恐鞭长莫及,故并无扩大之谋”。“英国在我国南边,曾经据守广东省城,仍然退兵,除一香港小岛,以便集船屯兵护卫贸易,并无土地之覬觐也”。至于英国派军舰到中国,则认为是英国的惯例:“英国四隅各处,无不派兵船以往,岂今中国一处而已。”^[20]当时有英商怡和洋行强行构筑吴淞铁路,先在江湾段开工,当时既受到清政府的指责和上海人民的反对。《申报》著文论述并赞同怡和洋行的这一行为,^[21]《汇报》则站在清政府的立场上攻击《申报》及

怡和洋行的行为。从这种指导思想出发,《汇报》载文反对英国在上海“擅行开筑”铁路,并为此与《申报》《字林西报》进行驳难。

《汇报》在《申报》的重压之下艰难挣扎,屡遭攻击,至被诬为其所载新闻“泰半失实”,又称《汇报》“无斧钺之公平”,贬低《汇报》的信用。^[2]两报的争论一直持续到1874年9月1日《汇报》易名《彙报》,至1875年7月16日易名《益报》直至退出历史舞台。

注释:

- [1] 戈公振《中国报学史》,三联书店,1986年,第120页。
- [2] 方汉奇主编《中国新闻事业通史》,第一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486页。
- [3] 王蕤《我在中国和美国的生活》(《My Life in China and America》容闳著),中华书局,1992年。
- [4] 《容闳与中国近代化》,珠海出版社,1999年,李吉奎《容闳与近代中国新闻事业》,第397页。
- [5][6] 汪敬虞《唐廷枢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第12页。
- [7-10] 唐廷枢年谱,1842年,转引自汪敬虞《唐廷枢研究》,第2页。
- [11] 《教会新报》,1873年6月28日,转引自汪敬虞

《唐廷枢研究》。

- [12] 唐振常主编《上海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627、628页,转引自李吉奎《容闳与近代中国新闻事业》,第399页。
- [13-14] 李吉奎《容闳与近代中国新闻事业》,第395、398页。
- [15] 郑观应著、夏东元编《郑观应集》下册,第1173-1175页。
- [16] 汪敬虞《唐廷枢研究》,第181页。关于《中西闻见录》的介绍,参见史和箴《中国近代报刊名录》,福建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82页,转引自李吉奎《容闳与近代中国新闻事业》,第396页。
- [17] 《申报》,1874年12月,转引自李吉奎《容闳与近代中国新闻事业》,第397页。
- [18] 《汇报》,1874年7月14日,转引自汪敬虞《唐廷枢研究》。
- [19] 《译辨字林报》,《汇报》1874年8月25日,转引自李吉奎《容闳与近代中国新闻事业》,第400页。
- [20] 《书汇报中外时势论后》,1874年12月19日《申报》,转引自宋军《申报的兴衰》,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6年,第34页。
- [21] 曹正义、张国瀛著《旧上海报刊史话》,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年,第55页。
- [22] 宋军《申报的兴衰》,第32页。

An Analysis on Hui Bao

MENG Peng

(School of Journalism,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100872)

Abstract: It is an interpretative research on the origin of Hui Bao, a newspaper of 1970s in Qing Dynasty.

Key Words: Hui Bao, Tang Tingshu, Zheng Guanying

[责任编辑:王辰瑶]